

胡适文存三集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胡適文存三集

卷三

左傳眞僞考的提要與批評

一 著者珂羅儼倫先生

這本左傳攷是歐洲的『支那學』大家珂羅儼倫先生 (Bernhard Karlgren) 做的。珂先生是瑞典人，在中國頗久，回歐洲後仍繼續研究支那學。在西洋的支那學者之中，除了法國的伯希和先生 (Paul Pelliot) 他要算是第一人了。他的專門研究是中國言語學，包括音韻與文法的方面。他在音韻上的研究最有成績，著有中國音韻學研究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及近年編成的傑作中文解析字典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中國向來研究古今聲韻沿革的學者，自陳第顧炎武以至章炳麟，都只在故紙堆裏尋線索，故勞力多而成功少，所分韻部只能言其有分別，而不能說明其分別是

什麼樣子至於聲母，更少精密的成績了。柯先生研究中國古音，充分地參攷各地的方言，從吳語閩語粵語以至于日本安南所保存的中國古音，故他的中文解析字典詳列每一字的古今音讀，可算是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開後來無窮學者的新門徑。

他在中國文法沿革的研究上也曾有很好的成績。我見着的只有他在一九二〇年發表的『論原始的中國文』(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nelle)一篇與此書的下半那篇論原始的中國文是說中國古文是有文法上的變化的，如『吾』『我』之別『爾』『汝』之別，『其』『之』之別，都是可以證實的。他當時並沒有看見我早年發表的爾汝篇與吾我篇，但他用的方法與材料都和我大致相同，故結論也和我相同；不過我作那兩篇文字時是在海外留學時代，只用了一些記憶最熟的論語孟子檀弓（柯先生所謂『魯語』的書）下的結論也只是概括的結論。柯先生却用了統計法，並且把各條例外都加上心理學上的說明，大可以補我的不逮。

我在爾汝篇之末曾表示文法的研究可以用來做考證古書的工具。但十幾年來，人

事匆匆，我竟不曾有機會試用這種工具來攷證古書。今讀珂先生這部書，見他的下篇完全是用文法學的研究來攷訂左傳，他這種開山的工作使我敬畏，又使我慚愧了。

二 作序的因緣

承著者珂先生的好意，把他這本小冊子寄給我。我在太平洋舟中讀完之後，曾費了半日之功，把書中大意節譯出來，做了幾十頁的提要，寄到廈門大學給顧頤剛先生看，請他看了之後轉給錢玄同先生看，並請他們兩位都做一篇跋，與我的節譯本同時發表。

不幸我的提要寄到廈門時，顧剛已不在那邊了；後來他從廣東來上海，至今還不曾見着我的原信。恰好陸侃如先生從北京來，帶着他譯此書的全稿來給我。那時我的一本原書又不在身邊，故我只能匆匆看過不能細細替他校對。現在此書已排好了，顧剛的序還沒有做，玄同又遠在北方，新月書店同人要我做一篇序。我對於左傳的問題沒有特別的研究，本不配說什麼。但為讀者的便利起見，我很願意做一篇提要式的序文。

三 什麼叫做『左傳的真偽』

珂先生此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專論左傳的真偽。下篇從文法的分析上研究左傳的性質。

先述上篇。珂先生先問，什麼叫做左傳的真偽問題？中國學者如劉逢祿康有爲等

人說左傳是偽造的，不過是說劉歆把國語的一部分與春秋有關的，改作春秋左氏傳；或是說當日原有一部左氏春秋，劉歆取出一部分做了春秋左氏傳，剩下的部分做了國語。依此說法，春秋本無左氏傳，故今之左氏傳是『偽托』的。但左傳的來源，叫他做左氏春秋也罷，國語也罷，却是真的古代史料。疑古最力的錢玄同先生雖說：

劉歆把國語底一部分改成春秋的傳，意在抵制公羊傳。

但他同時又說他

對於今之左傳，認為它裏面所記事實遠較公羊傳爲可信，因為它是晚周人做的。

歷史，而公羊傳則是『口說流行』，至漢時始著竹帛者。（古史辨頁二八〇）

這就是說左傳是一部『偽』的春秋傳，而却是一部『真』的晚周人做的歷史。

珂先生做此書，大致也持這個態度。他說：

假使能證明此書在焚書（前二一三）前存在，也不能因此證明從孔門產出。反

過來說，假使能說牠與魯國無關係，這也不是說此書是偽造的。

只有能證明此書是漢人所作來冒充焚書前的文件，然後可說牠是偽的。（頁三一

四）

他又說：

如果牠真是在紀元前二一三年以前寫定的，假使牠是紀元前七二二到四六八年中的事實的真記載，是作者尚可自由參考各種文件的時候所寫定的，——那麼，此書便是真的了。（頁四一五）

珂先生的話，與錢玄同先生的主張正相同。但錢先生先就承認左傳是『晚周人做的歷

史，而珂先生却先要證明此書是否『晚周人做的歷史』，是否焚書以前的真記載。

四 論左傳原書是焚書以前之作

珂先生自己似不曾讀過劉逢祿有爲諸人的書，只引據德國弗朗克（Otto Franke）的轉述；至於近人的著述如崔適的史記探原春秋復始等書，便連弗朗克先生也不曾見了。弗朗克的結論（頁一六引）是：

向來傳爲左傳一書，並非春秋的傳注，乃是一部完全獨立的著作，大約是晚周傳下的各種春秋之一；一直到了紀元前一世紀的末年劉歆竄亂之後，才同春秋連了起來，變成春秋傳。

此意與上文引的錢玄同先生的話完全相同。但珂先生總嫌『康有爲是個政客，並且是個宣傳家，』並且疑心『他的考證方法不是科學的論證，而有點新聞紙的味兒。』所以珂先生有點想替劉歆打抱不平。他提議要研究三項的佐證：

(1) 研究劉歆在祕府發現左傳的記載，

(2) 評判後漢前期關於劉歆以前左傳存在與否的別種佐證，

(3) 評判百年前司馬遷關於左氏春秋及其作者的記載。(頁一九二〇)

關於(1)項，珂先生實在未免太信任漢書劉歆傳了。他因此相信左傳在劉歆之前已有『牠的門徒，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就是翟方進』。(頁二一) 翟方進的自殺在紀元前七年，在劉向死之前一年。他與劉歆尹咸都是同時的人，也許都是同謀改造左傳的人。故無論翟方進傳說他『好左氏傳』一句是否可信，方進之治左傳並不足證明左傳之早出而早有傳人。

關於(2)點，(頁二五—二九) 珂先生也有同樣的錯誤。他所引的人——班固王充許慎——都是後一世紀的人；他們的話只可以表示紀元後第一世紀有某種傳說而已，並不足證明劉歆以前左傳的存在與傳授，更不足證明『劉歆以前左傳已很著名，並且自成一派的研究。』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並不敢說左傳是壁中書，而後一世紀的王充却敢說『春秋左氏傳蓋出孔子壁中』了。劉歆原書並不敢說西漢早年有人傳左傳，而後一世紀晚年的許慎在說文序裏却敢說『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了。西曆一〇〇年頃的許慎捏造左傳的傳授，還不過到張蒼爲止；而七世紀的陸德明孔穎達却敢捏造劉向別錄敘述左丘明傳曾申以下十餘世的詳細傳授表了！這都是世愈後則說愈詳，如滾雪球越滾越大。這不可以使我們懷疑反省嗎？

故對於這(1)(2)兩項，我們不能不說柯先生的評判是頗有錯誤的。

但關於(3)項，——司馬遷的記載——柯先生的見解却是很可佩服的。史記十二諸侯

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的一段，今文家多很懷疑，弗明克也很懷疑，但柯先生却認爲確

是史記的原文。(頁二九—三四)我以爲柯先生的主張是不錯的。這一段文字向來只引

關於左氏春秋的一小部分，柯先生也不會全引。我試引其相連的各部分如下：

孔子……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

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

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

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爲呂氏春秋。

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

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看這一段，我們可以知道司馬遷只認左氏春秋爲許多春秋的一種，並不會說它是一部春秋左氏傳。至於司馬遷說此書的作者是『魯君子左丘明』，這大概是一種傳說，或是一種猜想。這種猜想是錯的，說作者是『魯君子』更是錯的，這一層柯先生在本書下篇另

有專論。

柯先生在上篇（頁三四—四四）只要證明左傳的原本（左氏春秋）比史記早。他的方法是考察史記裏所有的左傳的文句。司馬遷用尚書，常把古奧難懂的文句翻譯成淺近的文句；他引用左傳，也是這樣。柯先生引了幾十條例（三四—四一）如左傳昭二十七年「我爾身」，史記作「我身，子之身也」；如哀七年「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史記改爲「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都可見「司馬遷改動左傳」；左傳是原本，史記是副本。」

故柯先生的結論是：「司馬遷看見一部鉅製的史書（他叫做左氏春秋）便從牠引用了許多材料。」所以我們可以說至少在前一〇〇年的時候，左傳已經存在了。」

司馬談與司馬遷去藏書解禁之時（一九〇）不遠；若此書是焚書以後的偽作，司馬遷父子不會容易受欺。柯先生因此深信司馬遷所見的左傳是作于焚書以前的。

故此書上篇的結論只是：左傳的原本（大概有別的名稱，並且沒有割成繫年的形式。）是焚書以前存在的。

五 從文法上證明左傳不是魯國人做的

現在要說此書的下篇了。下篇又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頁四五—七七）從文法上證明左傳不是魯國人做的。第二部分（頁七七—一〇〇）用書經詩經莊子國語等書來比較左傳的文法，證明左傳有特殊的文法組織，不是作僞者所能虛構的。第三部分（頁一〇〇以下）又用左傳的文法來比較『前三世紀的標準文言』，證明左傳是前四五世紀的作品。先說第一部分，這是柯先生最得意的一部分。這是用文法的研究來考證古書的初次嘗試，他的成功與失敗都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司馬遷說左氏春秋是魯君子左丘明做的。柯先生要試證此說是否可信，所以從文法上着手，把左傳的語言假定作『左語』，又把論語孟子的語言假定作『魯語』，再看左語是否魯國的語言。

他選了七種『助詞』作為比較的標準：

(1)『若』與『如』。

珂先生統計的結果是：

(甲)作『假使』解時，左傳全用『若』，而魯語全用『如』。

(乙)作『像』解時，左傳全用『如』，而魯語則『如』與『若』並用。

(2)『斯』字作『則』字解。

珂先生說，『斯』字這種用法，如『觀過斯知仁矣』，在魯語裏很常見，而在左語裏是沒有的。

(3)『斯』字作『此』字解。

珂先生說，『斯』字作『此』字解在魯語中是很常見的，而在左傳中是沒有的。

(4)『乎』字作『於』字解。

他說魯語裏『乎』字常常用作『於』字，而在左傳裏却是絕無而僅有的。

(5)『與』字作疑問語尾。

他說魯語常用『興』（歟）字作疑問語的語尾，而左傳裏竟全沒有這個用法。

(6)『及』與『與』

他又說，兩個並列的名詞之間，魯語內只用『與』字，如『富與貴』，『惟我與爾』，而左語內則兼用『及』與『與』，而『及』字尤其通行，如云『宋及鄭平』，『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魯語裏從不用『及』字。

(7)『於』與『于』

柯先生的最大發現是左傳裏『於』和『于』的分別，他指出這個介詞有三種不同的用處：

(甲)用如法文的 *chez, auprès de, vis-à-vis de*，置於人名之前，表示一種動作所向的人。在左傳裏多用『於』字。例如『請於武公』，『公問於衆仲』，『言於齊侯』，『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

(乙)用如英文的 *at, to*，或法文的 *à*，置於地名之前，表示一種行為所在之

地。在左語裏，多用『于』字，例如『敗宋師于黃』，『至于廩延』，『遂田于貝丘』。

(丙)用如英文的 *in, into*，法文的 *dans*，表示地位所在或動作所止，但其下不是地名，故與(乙)項不同。

此一類在左傳裏頗不分明，『於』與『于』亂用。例如『見孔父之妻于路』，『殺孟陽于牀』，但又有『淹久於敝邑』，『趙旃侵至於楚軍』。

柯先生作一個統計表如下：

	於	于
(甲)用如 <i>supra, de</i>	五八一	八五
(乙)用如 <i>a</i>	九七	五〇一
(丙)用如 <i>dans</i>	一九七	一八二

柯先生又從校勘學上得着有力的旁證。例如雷格(*Legge*)用的是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本，其中的『於』『于』多不嚴格地分開。而阮元左傳校勘記與經典釋文所載古本異同，與四部叢刊所據宋本，其中作『于』字之處，彙纂本皆作『於』。又伯希和在敦煌發見的古寫本左傳四殘卷，其中『於』『于』的分別也都和柯先生的（甲）（乙）兩類的區分相符合。

但左語裏的這些分別，在論語孟子裏却都不存在。魯語裏只用『於』字。如地名之前，左語常用『于』，而魯語一律用『於』。故柯先生作一比較表如下：

左語

魯語

（甲）

於

於

（乙）

于

於

（丙）

於 于

於

的。柯先生依據上列七項標準得的結論是：左傳的文法與論語孟子的文法是很不同的。故左傳不是孔子作的，也不是孔門弟子作的，也不是司馬遷所謂『魯君子』作的，因